



# 王羲之 神淡如菊 情炽如火

刘隆有

“右军《兰亭集序》诗,序人人诵读,故不录”,即《兰亭集序》因广为流传而未收录。《古诗源》收诗标准极严,在以诗史通识著称的沈德潜眼中,王羲之在东晋诗坛的地位,可谓崇高无比。

## 【 换鹅书扇 率真亲民 】

王羲之生性率真,言行举止,旷达洒脱,尽显风流。他喜欢观赏鹤,听说山阴县一个小山村里有位道士养了一群品种优良的白鹅,特起个大早赶去观看。见那群鹅只只美好,就请道士全都卖给他。但无论王羲之如何请求,道士就是不卖。这道士也是一位高士,尊崇老子《道德经》,想请一位书法家写一部珍藏,但珍贵的书写材料绢帛早就备好,一直遇不到理想的书法家。如今天赐机缘,书就在面前,他对王羲之说:“您若能为我抄写一部《道德经》,我便将这些鹅装在笼子里全都送您。”王羲之听罢大喜,索笔即书,用了半天时间写成,二话不说,提起鹅笼,大笑而归。

## 【 忧国如焚 忘我勇言 】

擅清谈,是魏晋风流独特的时代标志。王羲之很少参与,谢安却认为王羲之清谈的水平,远在专事清谈的名僧支遁之上。王羲之对清谈家们对国难时艰视而不见,避而不谈,一味谈玄谈老庄以自诩清雅超尘很是反感,闻之必直言斥之。清谈名士许询到清谈大家丹阳尹刘惔府上就宿,见其床帷新丽,饮食丰美,艳羡不已,感叹道:“若能保住这样的生活,那就远远超过在东山隐居了。”刘惔自信地说:“您若相信‘吉凶由人’,就不会怀疑我能久享此福了。”王羲之恰好也在座,立即讽刺道:“令巢,许遇履,契,当无此言。”如果是古贤巢父和许由遇到后稷和殷契,他们应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许询和刘惔闻之,顿时满脸羞愧。

东晋书法家王羲之,以其对汉字书写的非凡贡献,被华夏民族奉为“书圣”。一千六百多年来,人们对王羲之仰慕追效的热诚,不仅未有衰减,而且与时俱增。当今,随着我国国力日益强盛,汉文化势不可挡地风行世界,五洲四洋哪里有优雅的汉语,哪里就有至圣孔子的圣贤气象和书圣王羲之的风流逸韵。



神,正足以当此美誉,映照魏晋风流。

## 【 旷达风流 江左第一 】

王羲之,字逸少,因其曾任右军将军,世又称“王右军”。汉末魏晋南北朝,本是门阀士族主宰政治和经济的时代,王羲之的家族琅琊王氏,更是东晋门阀士族之首,势倾朝野,有“王与马(皇帝司马睿),共天下”之说。王氏子弟也多矜贵傲世,自认天生高人一等。王羲之却是个例外,他生性沉静质朴,不事张扬,幼时,不少人都以为他“讷于言”,才质平平,全无世家子弟应有的过人之处。转机发生在王羲之13岁时,那年,王羲之去谒见吏部尚书周顒,周顒察而异之。周顒正宴客,当时待客最重烤心,满座高朋皆未献,周顒特意割下一块,第一个敬给刚进门且落座未位的王羲之。周顒乃一代刚直名臣,时人目之为“巍如断山”,伟岸峻洁,气度卓然,令人敬畏。周顒此举,使得世人开始对王羲之刮目相看。

王羲之21岁那年,尚书令郗鉴派门生送信给王羲之的堂伯丞相王导,表示想在王家子弟中选个“佳婿”,王导对郗鉴的门生说,你到我家子侄们住的东厢房任意挑吧。郗鉴门生回去,把在王家东厢房所见如实汇报,说:“王家诸郎,亦皆可嘉,闻来觅婿,咸自矜持。唯有一郎,在床上坦腹卧,如不闻。”刚听到这里,郗鉴就下了断语:“正此好!”就这个“坦腹卧”的好啊!这正是王羲之。郗鉴满心欢喜,将人品书艺俱佳的爱女郗璿嫁给了王羲之。

郗鉴德高望重,功勋卓著,朝廷平定王敦、苏峻两次叛乱,郗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,此时正统重兵驻扎京口。郗鉴不仅长于政治军事,还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。能从众多“皆可嘉”的王氏子弟中脱颖而出被选中为婿,可见王羲之的出类拔萃,一时无人能与之比肩。

专门记述魏晋士人风流的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时人目王右军:飘如游云,矫若惊龙。”被人们比之管仲、诸葛亮的大名士殷浩,由衷赞美王羲之“清鉴贵要”,是个“清贵人”。被喻为“玉树”的庾亮,更称王羲之是“拔萃国举”,是时代的风流之冠。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谈到《世说新语》重点展示的是魏晋士人追求内在的智慧、高超的精神、脱俗的言行、漂亮的风貌,并好“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,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”时,特举晋人对王羲之的“游云”“惊龙”和魏人对嵇康的“孤松”“玉山”之喻。魏之嵇康、晋之王羲之,其内在气质、外观风

书法自东汉始,成为一门重要艺术,魏晋时期,更成为士人风雅必备的才艺,王羲之的家族尤重书艺。王羲之在书法方面天分极高,7岁时在同龄小儿中已有“善书”之誉。12岁时,他偶然见到父亲秘藏于枕箱中的前人介绍书艺的《笔说》,惊喜地悄悄读了。其父从王羲之运笔的变化中发现了这一秘密,问他:“你在哪里看到了我的秘籍?”王羲之笑而不答。其父担心王羲之年纪太小,理解了书中奥义,跟王羲之商量,想等他成人后亲自教他读和用。王羲之恳请父亲现在就教,若待成人,“恐蔽儿之幼令也”。其父见他如此聪慧自信,十分高兴,当即把书给了他。不到一个月,王羲之的书艺就有了很大长进。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卫夫人见了,先是一惊:“这孩子必然是研读并领会了书法秘诀,近来写的字已成大器。”继而感慨道:“这孩子将来在书法界的声名之盛,一定会把我淹没了!”

确如卫夫人所料。王羲之禀赋既高,又勤奋不懈,善集前人之大成,勇创自家之新体,一变历代朴质古拙书风,率性挥洒,既妍美流丽,新奇可喜,富于美感,又气度恢弘,气象高华,令人神往。梁武帝萧衍评价其书法作品“如龙跳天门,虎卧凤阁,故历代宝之,永以为训”。不仅卫夫人,就连汉之张芝、魏之钟繇这样的大家,都被王羲之远远超过了。

王羲之的文和诗均为东晋第一。南朝学者梁人刘孝标说,王羲之文章“高爽有风气,不类常流”,清初学者张习孔更认为,“六朝文章靡陋,独王逸少高古超妙”。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《古文鉴赏辞典》于东晋仅收八篇文章,王羲之就占了两篇,其中的《兰亭集序》,尤为历代传诵。

王羲之很少写诗,但偶一出手,水平就远超时辈。晋穆帝永和九年(353)三月初三上巳节,王羲之与谢安等亲友42人会聚兰亭,曲水流觞,赋诗抒怀,与会者皆一时贤俊,诗文能手。他们约定:每人须写五言诗,四言诗各一首,不达标者罚酒。王羲之超标,赋诗六首。谢安等10人达标,每人写成两首。另15人各凑得一首,16人一首也无。王羲之将诸人写就的诗汇成《兰亭集》并为之作序。王羲之不仅诗才敏捷,诗艺也高,《兰亭集》中的几十首诗,除王羲之的诗得以千载盛传,他人之作几乎无人提及。清代著名诗人和诗评大家沈德潜编《古诗源》,于东晋诗收录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“三春启群品”一首,且既赞全诗“清超脱俗”,又特赞“寓目理自陈”和“适我无非新”两句,称“非学道有得者,不能言也”,并在题解中说明



# 谷雨三朝看牡丹

刘永加

更甚,皇帝竟然直接将他贬为江陵士曹参军。作为朋友的白居易闻讯后,心情可想而知。他再次来到西明寺,面对盛开的牡丹,又写了《重题西明寺牡丹(时元九在江陵)》一诗:“往年君向东都去,曾叹花时君未回。今年况作江陵别,惆怅花前又独来。只愁离别长如此,道不明年花不开。”

## 宋代:洛阳牡丹冠天下

谷雨看牡丹,宋代首推洛阳。北宋时洛阳牡丹之盛,赏花风习之热,不输长安。《广群芳谱》载“逮宋,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”。对于洛阳的牡丹,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非常向往,恰巧他担任了四年洛阳的留守推官,给他欣赏研究洛阳牡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

欧阳修经常到民间走访,向花农了解牡丹的栽培史、品种花色、管理技术,以及牡丹的相关风俗民情等。有了深入细致的调研,欧阳修写出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牡丹的专著《洛阳牡丹记》,不仅牡丹类别、花种、生长地理环境等做了极为详尽的记载;欧阳修《洛阳牡丹图》一诗更是盛赞:“洛阳地脉花最宜,牡丹尤为天下奇。”从而进一步引爆了洛阳的牡丹热。

宋代洛阳人们欣赏牡丹的热情,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也有展现:“花开时,士庶竟为游遨,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幕,笙歌之声相闻。”《邵氏闻见录》也记载了当时赏牡丹盛景:“三月牡丹开,于花盛处作园圃,四方伎艺举集,都人士女载酒争出,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

间,引满歌呼,不复问其主人。”显然,洛阳牡丹花开期间,人们热衷于游园狂欢,持续至花落方罢。把洛阳赏牡丹推向高潮的是钱惟演任洛阳太守时举办的万花会,宋人张邦基的《墨庄漫录》记载:“西京牡丹闻于天下。花盛时,太守作万花会,宴集之所,以花为屏帐,至于梁栋柱栱,悉以竹筒贮水,簪花钉挂,举目皆花也。”洛阳当时被称为西京。

## 明代:亳州牡丹繁似锦

谷雨看牡丹,明代最数亳州。亳州地处安徽西北部,气候水土都非常适合牡丹的生长。亳州牡丹在明代盛极一时,山东《曹县志》曾记载牡丹“初盛于洛,再盛于亳州”。明代亳州牡丹的兴盛与一些名士广造园林是分不开的。初时,名士薛蕙辞官归隐家乡,在城南精心营造一处常乐园。园内广植牡丹,且均为精品,暮春花开,绚烂夺目。到了薛蕙之孙薛凤翔,不仅把常乐园的牡丹发扬光大,还潜心研究亳州牡丹,写出了《亳州牡丹史》。该书共四卷,仿照《史记》体例,活灵活现地描绘了牡丹的花容月貌,详尽总结了牡丹栽培管理技术,还记载了众多有关牡丹的轶闻。万历年间,亳州的牡丹园已经星罗棋布,引得文人们争相吟咏。其中薛蕙《牡丹》一诗写道:“红紫纷纷次第稀,故留国色殿春晖。”清代诗人刘开也曾观赏过亳州的牡丹,写下了不少咏亳州牡丹诗,其《谯阳观牡丹歌》写道:“一层紫雾一层霞,几团粉雪如杨花”“四面红霞铺作锦,千群紫玉种成田”。

写信劝其“暂废虚远之怀,以救倒悬之急”,快别搞虚的了,干点救亡图存的实事吧。

## 【 山河挚爱 佳句颂之 】

王羲之雅好山水自然,不喜欢京城里的繁华喧嚣,而爱会稽一带的“佳山水”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说他,初渡浙江,“便有终焉之志”。

在会稽内史任上,他特于永和九月上巳节召集亲友兰亭雅集,大得其乐。两年之后,又干脆辞掉官职,优游无事,专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,弋钓之娱。兴之所至,不远千里,穷名山,泛沧海,采药石,遍游东中诸郡,慨然叹道:“我卒当以乐死!”

远游归来,王羲之又沉浸于自家园林之中,或亲率诸子修植桑果,或抱弱孙游玩其间。有美味佳肴,即于园中三代共享。颐养闲暇,衣食有余,则时不时与亲朋知交小酌,虽不能像兰亭雅集那样曲水流觞、兴言高咏,但衔杯引满,说些稻花香蛙鸣、闻里趣闻,拊掌开怀,反更觉兴味无穷。有时候,他也避开儿孙,独自一人,静享“丝竹陶写”,让眼中所见、耳中所闻、心中所感在音乐中升华。在给友人的信中,谈及辞官后的时光,他动情地写道:“其为得意,可胜言邪!”

叶朗主编的《中国美学通史》指出,汉末魏晋士人“生命意识觉醒带来精神生命安顿方式的探寻这一全新课题”,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,就是他探寻“这一全新课题”的主要成果。王羲之的发现,当时士人“精神生命安顿方式”大多是两种,一种是“取诸怀抱,悟言一室之内”,一种是“因寄所托,放浪形骸之外”。前一种即崇玄颂空的空谈,后一种则颇多矫情,刻意做作。王羲之自己则是在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中“游目骋怀”“极视听之娱”,让生命在饱满充盈的自然生机中、在河山之美中畅游浸润,尽享愉悦。

在那个以清谈为时尚的年代,王羲之却偏重务实,就连徜徉山水,也是倾情投入,自自然然与当下的环境合而为一。独具的禀赋和才情、阔大的格局和襟抱,经这一番氤氲涵泳,冲口而出,便是妙语佳句,世竟传之效之,句遂成诗文经典,事则成轶闻佳话,所咏景观亦随之跃升为游览胜境。

王羲之游会稽山阴,就是如此。据晋人孔晔《会稽记》记载:“会稽境多名山水,峰崿隆峻,吐纳云雾,松栝枫柏,摧干棘条。澄壑镜彻,清流写注。”王羲之钟情会稽,尤爱山阴的明灵溪,溪流湖面清亮莹澈,漫步其间,山影、树影、人影,如在一面明镜中,游之常叹:“山阴路上行,如在镜中游。”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后来游山阴,也赞叹不已,曰:“从山阴道上行,山川相映发,使人应接不暇。”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是顶级书法家,人们爱他们的书法,敬他们的人品,乐于接受他们的审美倾诉,本就绝美的山阴,在国人的眼中心中,越发美得无与伦比了。

“如在镜中游”,这一妙悟,自然天成、意境澄澈,兼具精准的审美与普适的情怀。何止山阴一地,神州大凡山水佳处,游人倾心赏览,大都会或清晰或朦胧涌起这样的审美愉悦。自王羲之首发此妙悟,历代文人墨客争相相化用,遂成诗文经典意象,传咏不绝,终成千古文辞典范。

清代:曹州牡丹甲海内

谷雨看牡丹,清代盛于曹州。曹州即今天的山东菏泽。曹州牡丹在明代已经崭露头角,到了清代更是天下闻名,一时有了“曹州牡丹甲海内”之誉,备受名臣文士赏咏。山东在平人王曰高,曾当过康熙帝的启蒙老师,后官至礼部掌印给事中。他观赏过洛阳牡丹,回家乡时,又多次前往曹州赏牡丹,对比洛阳牡丹与日新崛起的曹州牡丹,他感慨万千,写了《曹南牡丹四首》,其中第三首写道:“洛阳自昔擅芳丛,姚魏天香冠六宫。一见曹南三百种,从今不数洛阳红。”他认为洛阳牡丹自古以来就独擅芳名,尤其是姚黄、魏紫品种名气最大。可是,现在看到曹州新培育出的三百余种牡丹花,洛阳牡丹就不值一提了。

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、吏部尚书陈廷敬,也对曹州牡丹赞赏有加。他虽然没有到过曹州,但牡丹花盛开时节,曹州佐吏向云泽曾将曹州牡丹赠送给他。陈廷敬对曹州牡丹赞赏不已,当即赋诗一首《向云泽自曹州以牡丹见遗赋答》,以示谢忱:“春风料峭几枝斜,秾艳依然带露华。牧佐旧为芸阁吏,曹州今有洛阳花。”

乾隆年间著名诗人李中简是河北任丘人。他曾担任山东主考,到过曹州,被雍容华贵的曹州牡丹吸引,写下《曹郡牡丹知名旧矣,余来以闰三月,正值花时,赋诗志慰》一诗。后来,他担任山东学政,来曹州主试生徒,再次欣赏了盛放如火的曹州牡丹,高兴至极,遂又赋诗四首,其中有“十郡年芳最此都,奇观真遍洛阳无”一句,力赞曹州牡丹可与洛阳比肩。文人雅士题咏不绝,极大提升了曹州牡丹的声名。

“谷雨过后再无寒,人间芳菲已向暖。”时至暮春,暖风拂面,寒意尽消,正是牡丹次第盛放、雍容压枝的绝佳时节。从唐代长安到宋代洛阳,从明代亳州到清代曹州,千百年间,谷雨三朝看牡丹早已从一季花事,沉淀为中国人独有的春日雅俗,融园艺之精、诗文之韵、民俗之趣于一体,绵延至今,依旧芳馨动人。

## 唐代:长安牡丹动京城

谷雨看牡丹,唐代首推都城长安。据《二如亭群芳谱》记载:“唐开元中,天下太平,牡丹始盛于长安。”从唐开元中期起,牡丹就在长安逐渐发展起来,举凡寺观、官衙以及官殿无不栽植。长安官宦宅院亦广种牡丹,每至花期,他们常邀亲朋赏花宴饮,吟诗作赋,蔚为一时风尚。

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长安曾掀起举国若狂的牡丹热潮。据《唐国史补》记载:“京城贵游,尚牡丹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,车马若狂,以不耽玩为耻。”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李正封咏道:“国色朝酣酒,天香夜染衣。”“国色天香”一词即由此而来。

长安的牡丹还见证了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的深厚情谊。二人同榜登科,同朝为官,唱和往来,交谊笃厚。元稹作为监察御史,奉命去四川彻查贪官,他雷厉风行,认真负责,秉公执法却遭贪官构陷。皇帝对返回长安的元稹没有任何嘉奖,反而把他派往形势更为复杂的东都洛阳,使元稹的工作一时陷入困境。

牡丹花开时节,白居易写下了《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》一诗:“前年题名处,今日看花来。一作芸香吏,三见牡丹开。岂独花堪惜,方知老暗催。何况寻花伴,东都去未回。诩知红芳侧,春尽思悠哉。”元稹在洛阳拒绝贪官们的拉拢收买,做了不少有益百姓的事,返回长安时,却再次遭到权贵宦官们的排挤。这次